

‘三家村’黑帮是民族败类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三家村’黑帮谈鬼

“三家村”黑帮是民族败类，其中成员有胡风、舒芜、姚雪垠等。他们利用《光明日报》作为阵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他们攻击党的文艺政策，污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企图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政策。他们散布谣言，攻击党的领导，企图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他们利用《光明日报》作为阵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他们攻击党的文艺政策，污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企图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政策。他们散布谣言，攻击党的领导，企图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

“三家村”沉冤

吴晗

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

廖沫沙，原名廖正兴，笔名“沫沙”，是“三家村”黑帮成员之一。他利用《光明日报》作为阵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他攻击党的文艺政策，污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企图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政策。他散布谣言，攻击党的领导，企图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他利用《光明日报》作为阵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他攻击党的文艺政策，污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企图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政策。他散布谣言，攻击党的领导，企图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

张占斌 孙建军著
三环出版社

“三家村”沉冤

张占斌 孙建军 著

三环出版社

琼新登字03号

“三家村”沉冤

张占斌 孙建军著

责任编辑：苏 斌

封面设计：周继平

*

三环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人民印刷总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字数：170千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ISBN 7-80564-831-X/K·25

定价：4.40元

引 言

邓拓，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

吴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名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廖沫沙，江青 30 年代丑行的知情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

他们出身不同，籍贯不同，经历不同，个人的脾气秉性不同。但是 19 世纪 60 年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却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而他们的命运又和包括共和国主席在内的革命元勋、学者以及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命运，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那场影响整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 10 年浩劫，就是由他们三人的首先罹难而揭开序幕的。历史为什么会让他们三人同遭大难？

是因为他们同时都兼有学者的身份？

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政府的主要领导者？

还是因为他们都交了“华盖运”，就该“倒霉”？

都是，也都不是！

从表面看，促使他们“运交华盖”的竟是一出戏、几篇杂文和《前线》杂志上他们共同操笔主持的“三家村”专栏。

文痞姚文元这样写道：

邓拓、吴晗、廖沫沙 3 人的创作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先是开路先锋吴晗出场，写了《海瑞罢官》。继而“兄弟”廖沫沙执鞭杀上，写了《“腊鼓催春”小记》、《“史”和“戏”》。最后主持人邓拓上马，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吴晗在《海瑞罢官》中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鸣不平，要请他（指彭德怀——引者）回来，剧本一发表，他们以为旗开得胜了，于是大叫“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并互相祝贺和鼓励，“破门而出”地“大干”一场，高喊要“扫清百家争鸣前进道路上的阻力”。

姚讲，在这一阵阵紧锣密鼓声中，在《海瑞罢官》所掀起的黑风迷雾造成的“热烈”气氛中，在吴晗“扫清道路”的棍子“扫”了一阵后，主将登台了。邓拓想从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的“生命的 1/3”开始，直到全部把他们腐蚀掉，成为“和平演变”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以便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接着姚文元对邓拓的《事事关心》一文进行了所谓“剖析”。他写道：

邓拓与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东林党人有着共同的抱负，意欲与党与社会主义对立，认为现在有阵阵“风声”、“雨声”，歪风黑雨，很不平静，应当进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事事关心”，欲更加公开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了！于是，他们便公开挂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厂变成一个公开的合伙公司……^①

在姚文元等人的笔下，邓拓成了“三家村黑店”的“黑老板”，吴晗成了“急先锋”，廖沫沙成了“黑伙计”或“黑干将”，他们还有一个合称：“三家村人”。颠倒黑白的上纲批判，无休止的辱骂和殴打，使邓拓那颗“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邓拓遗书——引者）的心，永远停止了跳动；吴晗夫妇那一对破碎的心也终于不再跳动了；廖沫沙虽然保住了一条性命，但已是身心交瘁。

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悲剧，仅仅是揭开民族历史大悲剧的序幕。从批判廖沫沙的“有罪无害论”（1963年5月），到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1965年11月），以至到发动对邓拓《燕山夜话》及他们3人的《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逐步升级，阶级斗争的迷雾愈来愈浓厚。

由砸烂“三家店”到砸烂各地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分店”，由挖三家村的黑后台，到把火焰燃向北京市委、

^①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文汇报》1966年5月10日。

中宣部；由揪斗邓、吴、廖到批斗彭真、陆定一，以至邓小平、刘少奇，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以文艺界为突破口，以批“三家村”和“三家村人”为契机，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

“三家村”的悲剧关系到“文革”悲剧的发生，反思“文革”的沉痛历史，不能不从揭示“三家村”沉冤开始。

美国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我们愿此书能为杜绝“三家村”和“文革”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尽微薄之力。

目 录

引言.....	(1)
“三家村人”与“三家村”.....	(1)
从邓拓的“说大话”谈起 “三家村”的由来 “吴南星”妙笔天下闻	
风满楼.....	(30)
搅浑一池春水 江青再露“峥嵘”	
《李慧娘》与“有鬼无害”	
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公演.....	(43)
毛泽东提倡宣传海瑞 吴晗对海瑞的评价 受人之托破门而出	
《评新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	(63)
走向前台 姚文元得令闭门造车	
政治阴谋家的恶意诽谤 《人民日报》	
和知识界的动向 吴晗的“自我批评”无济于事	
对《海瑞罢官》批判的升级.....	(106)
围绕着转载的风波 “引蛇出洞”和“聚而歼之” 两种政治势力的相持和较量	
《2月提纲》后面的尖锐斗争 毛泽东的一误再误 高举批判《海瑞罢官》的	

旗帜

《评“三家村”》的出笼	(164)
-------------------	-------

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 “三家村”的“攻防策略” “三家村”的“罪证”

邓拓、吴晗、廖沫沙蒙难囚身	(205)
---------------------	-------

断骨销魂证苦衷 家破人亡的悲剧
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 横扫一切的风暴

历史的公正评价	(252)
---------------	-------

揭开云雾见青天 邓拓追悼会的召开
吴晗追悼会的召开 廖沫沙痛斥“四人帮”

后记	(266)
----------	-------

“三家村人”与“三家村”

从邓拓的“说大话”谈起

“……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

——邓拓《说大话的故事》

这里引录的是邓拓对管子“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的诠释。管子的名训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了，其中并无什么深奥难解之意，但邓拓为什么还要不惜笔墨、博引例证对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大加解释呢？

要知道，邓拓引述和评点管子这句话，正是在中国人民经历了一个发热的年代不久、开始清醒过来的时刻。

1958年，中国进入了狂热的大跃进年代。整个民族一下子沉浸在极度的亢奋状态中。怀着对未来美好理想的急切向往，带着对旧中国饥饿贫穷的恐惧，站起来了的中国人，以高度的激情全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但是，由于从上到下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冒进，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

严重地泛滥开来。

这种在缺乏经验和基础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优越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的作法，激发了人们凭借战争年代的一些经验急于改变中国长期贫穷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人们相信“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①。

由于经济建设指标越抬越高，因而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就在这股热气中严重地弥漫开来。许多领导干部看上级领导脸色行事，不惜弄虚作假，唯浮夸是荣。有些领导人甚至带头撰写文章，大批“悲观论”、“条件论”、“机械论”。《人民日报》社论甚至认为“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②。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发射”早稻和花生“高产卫星”，亩产量分别达到36900斤和10000多斤。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山东寿张县亩产1~2千斤的指标已经没有人提了，提5千斤的也不多了，全县正在开展亩产万斤粮的运动。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达到

①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8月27日。

②《人民日报》1958年7月3日。

130000多斤。

1958年7月份，农业部根据各省的报告匡算汇总全年的粮食总产量，可达到1万亿斤（事实上，即使到了80年代末，粮食也仍未达到这个数字）。

这些庞大的数字毕竟是不能长久骗人的，连发动这场“大跃进”的毛泽东也感到其中大有问题。

但由于错误地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批判了“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许多人为避免被打成“右”倾错误，不敢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敢讲真话，即使心里明白，也违心地说假话。事实上，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伤害了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少人鉴于现实情况，不愿再招惹是非了。

邓拓在大跃进的浪潮刚刚掀起时，就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邓拓在全国解放前就办过《晋察冀日报》等报刊，解放后任《人民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作为党报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地位是十分重要和敏感的。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对邓拓及《人民日报》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他认为邓拓等在1956年下半年在周恩来、陈云等主持反冒进时，跟着犯了“右”倾错误。主要是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那篇经刘少奇、周恩来审定的旨在纠正经济建设中冒进情绪的《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毛泽东认为反冒进给6亿人民的建设热情泼了冷水，而那篇社论只讲缺点，不讲成绩，是采用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笔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

要求《人民日报》就“1956年6月以后宣传反冒进的情况如何，要检查一下，检查那时的评论与消息。”

此后不久，邓拓被调离《人民日报》社，改任北京市委主管文教、宣传工作的书记。

作为《人民日报》的社长和总编辑，邓拓对于大跃进中的“左”倾冒进等问题是有比较深刻认识的。只是在当时形势下，无法直抒其意。

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的错误，我国国民经济不仅未能实现“跃进”，相反却造成1959年至1961年国家经济的严重困难。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粮食缺乏，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瞎指挥、浮夸风随处可见，这逐渐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58年11月初，在郑州召开会议，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强调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批驳了陈伯达等主张废除商品、货币，搞统一调拨劳力、统一调拨资金、统一调拨产品的错误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这次会议成为党纠正错误的重要开端。

1958年11月末，中央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继续纠正“共产风”的同时，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讲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缩下来，还提醒大家要

有清醒的头脑，不要相信假话，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接着，又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再次批评了“共产风”、“浮夸风”等不合实际、与实事求是的作风相忤的错误倾向，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那种想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还规定，“农村公社的全部劳力，用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一般不应少于 80%”。这项规定是对滥用农村劳力，无偿抽调农村劳力去从事其他劳动的错误做法的限制，对于“共产风”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1960 年 9 月中央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 年 1 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党的“八字”方针，全会要求全党全国人民认真贯彻“八字”方针的精神，搞好经济工作的整顿。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提出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问题，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使工作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他希望 1961 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他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全会强调要彻底检查和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五风”，彻底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全会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毛泽

东的号召，推动了各级领导人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他们在调查中着手总结经验，发现和解决问题。

1961年初，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在市委党委会上对宣传工作谈了这样的意见：现在暂时困难时期，“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提倡读书，才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就不会斤斤计较。”“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怎样发愤图强、发奋读书的故事。”《北京晚报》编辑部认为这个意见非常好，于是决定开辟“燕山夜话”专栏，亲请邓拓主笔。在报社反复要求下，邓拓答应每周写两篇杂文。从此，邓拓用马南邨为笔名，开始了“燕山夜话”的写作。当时，邓拓曾笑着向编辑解释说：燕山，是北京的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邨是笔名，马南邨原是我们办《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的确，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邓拓和他主持的《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几度驻河北省阜平县马南邨，在生与死的对敌斗争中，他与马南邨群众结下了手足之情。

邓拓承担“燕山夜话”专栏的写作，是在繁忙的公务间隙中进行的。邓拓当时曾戏称“燕山夜话”的写作是被拉上马的，然而，从他创作的100余篇文章中看，每一篇都充满着智慧，凝聚着心血。

“燕山夜话”发表在《北京晚报》副刊上，由于副刊必须头一天预先拼版，报社事前与邓拓商定，副刊预拼时右上角留下一块容纳1500字大小的版面，邓拓头天把文章写出，当天早晨由报社派人取回手稿，看完就发

排上版。由于“燕山夜话”文章引证的材料浩繁，很多文章的出处在报社图书资料室里很难找到，还商定资料来源由邓拓自己负责核准，报社只负责文字方面的校订。后来，报社的编辑人员回忆，在这些方面从未发现差错。就这样，一篇篇深寓哲理、潇洒流畅的杂文文稿从邓拓笔下流出。一年半的时间，共写出 154 篇。

1961 年 3 月 19 日，邓拓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里发表了第 1 篇文章：《生命的 1/3》。该文针对当时有些人面对暂时困难，意志消沉，精神生活空虚，班前班后无所事事，轻易抛却时光的现象，鼓励人们应当“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不要让宝贵的时间白白地浪费掉，要利用业余的 1/3 的生命时光“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他认为评估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只要“看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一句话，说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们要想使自己在有生之年使人生过得更有意义，就必须不断进取，永远学习。这一思想内容实际是贯穿于邓拓写作《燕山夜话》始终的立足点和根本目的。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又写出了创作《燕山夜话》的另一个目的，“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 1/3 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之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在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下，邓拓陆续创作了几十篇关于读书、学习、求知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到学习、读

书的动机、目的、任务、方式方法、步骤等各方面内容。如《欢迎杂家》，提倡治学之人应把专深的学问和广博的知识结合起来。强调无论做什么样的领导工作或科学研究工作，都应该如此。认为专门的学问是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的，而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的，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在《不要秘诀的秘诀》一文中，作者严肃批评了那些“贪图省力，不肯下苦功夫”的人。要求人们对于学习要脚踏实地、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只要这样痛下功夫，不断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而决不可“或作或辍，一曝十寒”。文章还着重指出，学习必须与实际相联系，并反对教条主义的本本主义，要通过学习，达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目的。《从三到万》，讽刺和批评了那位只知一、二、三，便妄自尊大“欣欣然”的古人，以至连十、百、千、万都不知该怎么写，闹出了一场只知划“横”、“竖”的笑话来。借此，作者强调对待学习一定要虚心，只有踏踏实实、谦虚谨慎地无休止地学下去，才能防止一知半解。在《不要空喊读书》一文中，作者列举了3种只会空喊读书、实际上不读书的人，精辟地介绍了各种正确的读书态度和读书方法，言之有物，切合实际，拨动了读者的心弦，给人们以教益、启发，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一个长期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上辛勤耕耘的人，一个文教战线上的排头兵，直面祖国大地上发生的“天灾人祸”，怎么能没有自己的思考呢？

在写作《燕山夜话》期间，邓拓曾写下一副对联：